

# 论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 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sup>①</sup>。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或者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于上述两类之间,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本文也把它归入此类,但这是比较勉强的。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阶层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籍的性质,但其身份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久长,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

魏晋士族的社会构成,大体就是这样。

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即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这五族门户以其与东汉旧族渊源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一种是来自东汉高层的世家大族,只有谯国桓氏属此。桓氏为东汉桓荣之后,是确凿不移的事实。但是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子遗,顾颜事仇,竟不敢追认其先人世系,更不敢以门户骄人。所以桓彝、桓温完全同于新出门户,而且在新出门户中也是不受尊重的。

一种是虽有旧族渊源关系,但先世阀阅可追溯至东汉者仅一两代而已。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父泽,伯父柔,总角往候郭泰,访以才性所宜,后均至二千石。王泽、王柔以上,则名讳仕履无闻。琅邪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

\* 本文系《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后论》,意在综述全书的观点。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祥传》及《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西汉王吉，但是疑信难详，所以《世说人名谱》只以王祥、王览之父王融为王氏第一世而不再往上追溯，并谓融“辟公府，不就”。从《世说新语·排调》载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同郡临沂的王导“共争姓族先后”一事看来，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也是符合事实、符合时人看法的。但是，我们只能笼统地认为琅邪王氏在东汉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而不能作进一步的确断。东汉末年，王祥于战乱之时扶母携弟避居庐江至数十年之久，远离地著，其宗族虽或尚在原地，但门户当已就衰。后来王氏复起，主要是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来有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一类，其先世只可以尾附于世家大族之列，充数而已，而不能视为世家大族入魏晋以后的真正代表。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勉强归入旧族门户的类别。

一种是魏晋新出门户，有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庾氏庾嶷、庾遁起于魏晋。其父庾乘虽汉魏人，但汉桓帝时为县门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始得为襄城令。庾嶷仕魏为太仆，庾遁诸子又贵达于西晋，庾氏始得为士族。谢氏谢纘仕魏，先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sup>②</sup>。

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东晋的当权士族，除桓氏情况特殊可以不论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出于东汉世家大族的所谓旧族门户。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东汉门户渊源可以探寻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

东晋当权士族的门户背景，大体就是这样。

但是，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新出门户多一重凭借，多一份优势，因而也都被认为高出一等。魏晋的社会观感本是如此。取代曹魏的河内司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门户自豪，东晋建立前后琅邪王氏特受倚重，这些都非偶然。

魏晋社会中流行的这种门户观念，被那些处于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的人着意渲染。在他们看来，旧族门户哪怕权势日替，其社会地位也比大权在握的新出门户为高。《世说新语·简傲》所载东晋中期陈留阮裕嘲笑陈郡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就是显例。

阮裕所从出的陈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确较早一些。《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案阮氏自阮籍以上，可以追溯两代<sup>③</sup>。阮籍父辈：阮瑀，少从蔡邕学，后仕曹操为记室；阮武，清河太守；阮凯，汝南太守（一作汝南内史）。阮氏这一代，以学行和官守论，均属儒学无疑。阮籍的祖辈：阮敦，仕履无闻；阮略，齐国内史；阮谡，杜笃《新书》谓为侍中，《阮氏谱》则谓其“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sup>④</sup>。阮氏这一代以儒学出仕，也可概见。但是再上一辈，史籍就无征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辈就是从这种儒学世家转入玄学家族的。

阮氏作为旧族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世，并非承胤久远，累世不衰。这样的门户，在东汉也仅能尾附世家大族，难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陈留阮氏的历史，比起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来，似乎只是略胜一筹。而这个家族在阮瑀以后，尽管名士辈出，但由于门风濡染，宦情似薄，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居位执权的人，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际上日趋衰落。虽然如此，放达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门户历史自矜，不承认其时炙手可热的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准此，在旧族门户中地位远远高于陈留阮氏的弘农杨氏杨俊期和颍川荀氏荀伯子，他们贬抑新出门户的傲慢态度（分见《晋书》卷八四及《宋书》卷六〇），在当时看来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以旧族门户自矜，在东晋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魏晋士族中旧族门户的数量本来极有限，其中之过江者已属寥寥，真正够得上世家大族之后者更没有几户。所以江左立业立功，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新出门户。东晋旧族骄矜作态，并不是由于他们强大，而是由于新出门户已扶摇直上，以致于本已就衰的旧族门户对自身地位，更产生了一种危迫之感的缘故。到了南朝，魏晋新出门户的地位也受到威胁，他们自傲于凭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也出于同样的理由。《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思伯虽贵重而不骄人，答人问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人是懂得“衰至便骄”，不衰无须骄矜作态的道理的。

首先对士族恃其门户地位骄矜作态现象作辩证分析的，是唐长孺先生。唐先生在论及门阀士族衰落和寒人兴起时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sup>⑤</sup>。我赞成唐先生的卓见，只是想作一点补充说明，即一般说来，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旧族门户“深沟高垒”，所戒备的是新出门户；在南朝皇权政治之下，王、谢士族“深沟高垒”，所戒备的不只是寒人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皇权的侵渔。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所戒备的对象不同，反映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异。但是用“深沟高垒”的办法作自救之举，两者却是一样的。

## 二 东晋侨姓门阀的主要来源

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使用的称谓非常混乱。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了求得用词的一致，一是由于这两个名称反映现实比较准确。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势力，不论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都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权位。士者，仕也。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sup>⑥</sup>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份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定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征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授经。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是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柢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荀组见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

同时还可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

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阳，南来亦并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古老的门风。《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户、重女红（参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他们也较多地保存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是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阂。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多少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柢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流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乱，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漫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指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较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sup>⑦</sup>。近年祝总斌同志撰《刘裕门第考》<sup>⑧</sup>，详尽地论证刘裕为低等士族，亦即次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且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

们本人所处的社会阶层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士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条件之一。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sup>⑧</sup>。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坠。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他的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的。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揭诸文中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前揭诸文的原意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结合，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对于宗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却是默认了的。曹魏的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准而不计人丁，为承认宗族庇荫劳动人手的特权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将出现重大变化的先声。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并非两者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sup>⑨</sup>一文中有所分析，可以参看。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所以东汉宗族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和帝以后皇权政治出现异常现象之时，公卿大夫面引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败，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甚至东汉瓦解，董卓入洛，开头也只得“沙汰秽浊，显拔幽微”（《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表现为整饬朝纲，延续汉祚，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当汉已不汉之时，曹操力翦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而“犹畏名义而自抑”（《通鉴》建安二四年条司马光语），只敢自况于周文王。由于宗族有拥汉的潜在力量，所以

皇权易姓并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情。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汉魏西晋，宗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或者角逐者为了战胜更为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会尽可能地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战胜了袁绍的曹操，就是这样。

角逐的胜利者组成新的皇权。皇权稳固下来以后，它与宗族之间又会出现上述的关系。不过曹魏政权有点特殊，它并未等到真正稳固下来，就被强大的宗族司马氏取代了。尽管如此，晋之继魏，犹汉之继秦，亦犹唐之继隋，虽有损益，主要的一面却是一脉相承。帝姓换了，政治格局依旧。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动乱后回归稳定时常有的反复现象，与阶层的变动恐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sup>①</sup>。

从理论上说来，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儿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此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它。世家大族为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争，结果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

曹魏时期，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以学术助长政治纷纭。司马氏代魏，他们悉归于晋。西晋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比过去显著，但也还不足以超越皇权和司马宗室之权。直到八王之乱，士族名士仍然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甚至王与马的结合，起先也只是士族名士王衍依附于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助司马越经营洛阳朝廷。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了江左，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才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西晋琅邪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他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疏而又疏。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份量。除了王导兄弟已借来江左以外，作为中朝东海王司马越府掾属的众多士族名士纷纷渡江，恰好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有份量的砝码，因而江左门阀政治才能水到渠成。

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这同样是政治条件使然。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袭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朔，拥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既然武、惠、怀、愍的皇统已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据有江左地利条件的司马睿自然成为他们瞩目的对象。这是司马睿得以继承晋统的有利条件。司马睿明白自己的有利条件，也明白自己的不利条件。所以他权衡形势，必须等待关中的愍帝被俘，北方抗拒胡羯的华夷人士联名劝进再三之后，才答应先以晋王名义居位，然后再做皇

帝。有了士族支持，有了华夷劝进，其他武力事功之士也就跟着靠拢过来，不敢心存覬覦而甘冒不韪。这样就形成了皇权与士族结合的**门阀政治**的较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不过皇权与士族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之间从来不是交融无间。元帝正位时佯作姿态，引王导同登御床，并不是王与马完全协调一致的表现；它只是表明王与马之间，也就是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原因，暂时处于不平常和不正常的状态。

南渡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其迫切的家族利益急待追求。首先，他们要庇托有所，脚跟能够立定。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用，但绝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从晋元帝方面说来，与士族共有神器，毕竟不是他所心甘的。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这里又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的平衡和侨姓士族各门户之间的平衡），还须要经过一场实力的较量才行。于是我们看到，有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以抑王氏兄弟之举，由此又引出王敦与执政王导勾结，以南人钱凤、沈充为援共叛晋室之举。王敦一叛，以“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吞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告失败，这说明司马氏的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政的庾、桓、谢氏，背景虽各有不同，但都不能违背这一结论，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始终不容变动。

淝水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其时士族势力已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成为枯木朽株。孝武帝所作重振皇权的努力，功效甚微而触发的矛盾却很复杂。门阀政治的格局，以太原王氏两支各自凭借后党妃党的地位，交斗于主相之间而呈崩坏之势。孝武帝死后，破坏门阀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执政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而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

王恭起兵败死后，桓玄并吞殷仲堪等上游兵力，进驻建康，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的势力，这是重振门阀政治的一个时机。都下重要的门阀士族人物，几乎都支持桓玄，接受了桓玄的官职。《通鉴》元兴元年谓：“玄初至，黜奸佞，擢隳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世说新语·文学》还说其时泰山羊孚从京口诣玄，致牋称颂曰：“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玄即用为记室参军<sup>⑨</sup>。对于桓玄代晋立楚，破坏共天下的局面，门阀士族自有其不安之处，但未见有多表现，只知羊孚曾坚持异议。《世说新语·伤逝》：“桓玄当篡位，语卞鞠（卞范之）云：‘昔羊子道（羊孚）恒禁吾此意（案此时羊孚新丧）’”，云云。羊孚禁桓玄篡晋，可能反映了怯懦的门阀士族的共同心愿，但并无实际作用。真正有力量反对桓玄此举的，是北府将子余的刘裕。《宋书》卷一《武帝纪》载刘裕语何无忌曰：“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

看来，都下的门阀士族对待桓玄的态度，颇似昔时他们之对待王敦。迎桓玄入都并与合作，意在去司马道子的专擅而长门阀士族的威风；阻桓玄称帝立楚，意在维持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的共治而拒桓玄独吞江左。江左之初，诸门户与王敦关系，正是如此。这是门阀政治在权力分配上所必需的。君以此始，亦必以终。不同的是，王敦一叛再叛，门阀士族不但直接表示了意见，而且也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即赞同其“清君侧”之举而用兵力阻止其篡晋之谋，

态度明朗，反映门阀士族力量强大；桓玄兴师入都及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而未敢公然阻止其篡晋，态度暧昧，反映门阀士族的虚弱。

刘裕驱逐了桓玄，使桓玄的起落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反照。昔日决断枢机的门阀士族，一般都丧失了政治作为，从王谧奉玺册于桓玄开始以至南朝之末，在改朝换代之际总是随例变迁，无复秦楚。与之相应，东晋统纪由次等士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次等士族收拾残局，代晋建宋，格于各种原因，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还需要相当准备，还得有一个过程。东晋义熙政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历史内容无非是为门阀政治回归皇权政治准备必要的条件。

## 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吴姓士族政治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侵犯。王敦起兵，曾责备刘隗辈行刻剥之政，其中一条是“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唐长孺先生认为侨民旧籍无从稽查，依旧名所取的当为江南土著豪强地主的佃客，而王敦此举，意在联络江南大族，激起他们对晋室的怨恨和反抗<sup>③</sup>。这一分析是中肯的，同以后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激起东南八郡大姓和被征发者一起反抗，情形大体一样。

吴姓士族坚守自己的经济利益，东晋政府正常的租赋兵徭取给越来越困难，而兵役征发困难尤大。因此，从北方南来止于江淮的流民群，就成为东晋朝廷注目的对象。流民群驻足未稳，田宅不立，同仇敌忾，有抗胡的热情。但是他们在艰险中觅道南来，本未受江左政权的羁绊，对江左政权未必竭诚效忠。江左政权也必然能够理解，流民群可用而未可随意用，要用得其时，用得其法，用得其人，用得其所，而且还要估计风险。虽然如此，朝廷每当困窘之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流民群。可以说，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间接关系。

征发零散的流民之为扬州江南诸郡僮客者为兵，成为王敦之乱的导火线，是众所周知的。东晋为平王敦之乱，没有其它兵力可资凭借，仍然只有动用流民武装。此事发谋于郗鉴、桓彝等人而为明帝采纳，卒灭王敦。但是作为后果，却孕育出流民帅苏峻之乱，这当然是郗、桓辈和晋明帝始料所不及的。

尽管苏峻之乱教训了东晋当轴诸公，但仍无法改变东晋对于使用流民的需求。于是，产生了安顿流民以图得其死力的长远打算，即给流民田宅，用强藩加以控制，组织流民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外的要地作为威慑力量。这样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本意主要是用于防御外敌，不是用于北伐，更不是用于内争。使用流民成功的事例，首先是郗鉴对京口的经营。后来谢玄从流民和流民帅中募北府兵将成功，由此而有淝水之战的胜利，这与郗鉴早期经营京口因而得以羈縻江淮以北的流民帅，当有重要关系。

与下游北府经营相应，上游也出现了襄阳的经营。诸庾、诸桓控制上游时都十分重视襄阳流民的作用，其经营办法与下游京口相似。所以襄阳的流民武装，得以成为屏蔽荆、江的重要力量。不过，下游的建康得京口的保障，上游的荆、江有襄阳的武力，彼此各有所恃，又使东晋一朝上下游势力对峙的局面得以长久相持。本来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威慑力量，在内争中实际上起着无形的作用。

东晋一朝门阀政治，通常是由两三家当权士族分据内外，相抗相维。表面看来，这只是荆、扬的地域条件形成的，但是归根极抵，还是由于上下游两支由门阀士族支配的主要是由流民组成的武装形成均势，互相制约使然。苏峻乱后的七十余年中，分据上下游的武装力量没有以刀兵相见，使东晋社会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也使上下游的流民武装免除了为士族门户间的权力角逐而流血牺牲，这毕竟是一件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孝武帝死后，随着纷纭政局的发展，上下游所依仗的流民武装北府兵和襄阳兵，纷纷从抗御外敌的前线直接转入内战。其领袖人物，上游是杨佺期，下游是刘牢之，都可以归入次等士族代表人物一类。他们卷进内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使自己脱离门阀士族附庸武装的地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但是数十年相沿的门阀政治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摸索不到成功的道路，杨佺期终于成为门阀士族桓玄进入建康代晋自立的垫脚石，刘牢之也被桓玄迫蹙至死。不过，他们失败的教训终于使刘裕聪明一些而获得成功，而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割断，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仍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 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东汉大田庄经济状况，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了。

汉魏之际的大动乱，使北方本来是比较巩固的大田庄突遭破坏，普遍地发生了抛荒易主的情形。《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所谓“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谓“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等等，当是包括大田庄破坏情况而言。等到大乱稍息，流民渐归，田庄主抢占土地，恢复产业，又形成一股浪潮。荀悦《申鉴·时事》所忧富人专封专地，主张“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就是针对这股浪潮而言。司马朗、仲长统、荀悦，都是其时农村变化的见证人。至于荀悦所俟的“制度”，依魏晋的实际而论，不是遏止这一浪潮，而是寓承认于限制。

乱后复起的大田庄主人，有些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但并不都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之中，有的成为魏晋士族中的所谓旧族门户，有的就是所谓新出门户。《水经·清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业庾公昌。’”新野庾氏代东汉国戚樊氏而兴，当是汉末大乱以后的事，说明新野庾氏门户新出。庾信《哀江南赋》所叙其先人“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当指《元和姓纂》卷六所载司空新野庾孟而言。兴于樊氏之后的庾公，应当就是这个庾孟。但庾孟子嗣无闻，门户似乍起乍落，这又说明新野庾氏在当时也只能忝附于旧族门户之尾，与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差不多。新野庾氏在魏晋时期并没有真正昌盛起来。永嘉南渡时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于江陵，到南朝齐、梁间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兴起。在西晋渐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颍川。颍川庾氏更无疑属新出门户。

大田庄产业，一般都是山川与耕地相连的多种经营，东汉固然如此，魏晋也是如此。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所载《山居赋》注，对此有所征引。如谓仲长统曰：“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sup>⑭</sup>。又如引应璩《与程文信书》：“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sup>⑮</sup>。又如引石崇有“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即所谓金谷<sup>⑯</sup>。魏和西晋士族在北方的田庄，大抵类此。

永嘉以后，士族南来，都汲汲于求田问舍，经营产业。他们都是山泽并兼，同北方田庄情况大体一样，所以才有东晋禁止封锢山泽的法令。《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记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但是“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煊山封水，保家为利”，士族竞夺之风，不可辄止。他们竞夺的产业，与未离地著的北方士族的大田庄相比，由于缺乏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显得根基不稳，但就其规模说来则有过之。谢玄晚年经营的始宁山居，其规模和状况因有《山居赋》行世而得以知其详情。《赋》云前举仲长统、应璩所说的田庄，“势有偏侧，地阙周员”，比之谢氏新开发的始宁山居，要局促多了。谢氏其余产业及别家士族产业的详情，我们就知之甚少。不过从《山居赋》注所云蔡氏、郗氏、陈氏以及昙济道人各与谢氏占有始宁一奥之事，以及《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所云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之事看来，其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

侨姓士族的这类产业，全是依仗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权力得来，又成为支持江左百年门阀政治的物质基础。至于象《颜氏家训·涉务》所言“过江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的“朝士”，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恐怕不多。谢灵运一方面夸耀其始宁山居的富实，一方面表示应当知足，但前提还是要有田业。故《山居赋》注曰：“非田无以立耳。”《宋书》卷五八《王惠传》：琅邪王氏王惠“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这是晋宋之间的事。按照王鉴之见，无田者是无由得食的。至于王惠“何用田为”、“何用食为”，恐怕只是士族名士“言清理远”的标寄之词，不能证明他不食，也不一定能证明他无田。而王鉴若只靠聚敛营田而不假借政治势力，最多也只能成为一般富户，断难置得像谢氏始宁那样的山居产业。

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其经济表现是，东晋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农的赋役维持其存在；门阀士族则主要靠占山护泽以图发展，而占山护泽自然又要分割山泽之内本属朝廷的户口。所以，经济上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朝廷为了图存，或诏免田庄奴僮为兵，或限禁占山护泽。但这些只能偶一为之，难收实效。因此，反映在政治上，是皇权无法伸张，士族自行其是，门阀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下去。

刘宋树立了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势力依然如旧，甚至刘宋大明年间的法令，实际上还承认他们竞夺山泽田园的既成事实。南朝士族犹得骄矜作态，可以从这种经济背景作出部分解释。

## 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

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门户说来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能起决定作用。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得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有由于入仕而得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sup>⑤</sup>的晋代常情。他所谓“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

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借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衰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死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之于太常桓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sup>⑥</sup>，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比较罕见了。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学清谈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晚近余英时先生又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了独到的发挥<sup>⑦</sup>。这些全是创新之作。在我看来，学术思想演变同政局演变很有关系，但是前者并不只是后者的先导或反应，两者更非同步发展。得天下的司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上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此后出现的情况是，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自己对玄学的态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谱的“欲助世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上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sup>⑧</sup>、范粲<sup>⑨</sup>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阮籍见张华《鹤鹑赋》而叹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族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谓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在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sup>②</sup>。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胜任门阀政治的实职。胜任这种实职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涉玄风而又不自囿于玄的人。

余英时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西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sup>③</sup>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恐非如此；余氏以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亦暂置不论。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仰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掾”之称<sup>④</sup>；竹林人物向秀直谓“儒道为一”<sup>⑤</sup>；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sup>⑥</sup>。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治平之说，在西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很高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濛、刘惔辈就无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

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晋书》<sup>⑦</sup>：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存在了。南阳范汪、范宁两代成《春秋穀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竟为南朝儒学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需要。刘裕稟分有在，不学无文。据说他晚年颇好清谈，这只是个人附庸风雅的尝试而已，真有实际意义的，倒是他所颁兴学之诏。

##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已如前论。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为新朝的皇权政治；连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门阀政治就更不用说了。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而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动乱。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象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不过权臣挑起动乱，还不致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破坏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在门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定全面的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还可以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从王敦、苏峻之乱以后门阀政治格局最终确立算起，东晋七十余年和平环境的获得，与这种条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门阀士族在这个时期，是江左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门阀政治所依据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侨姓士族本身，在江左立足不易，生根更难。橘逾淮而为枳。比起在本籍继续发展的北方士族，比起吴姓士族，他们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土不厚，根不深，宗族不大，一受挫折就容易凋零。士族专兵本是门阀政治的常情，王、庾、桓、谢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一般只是掌握军队指挥之权，很少有自己驰骋疆场的。而最后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浮现出来的士族太原王氏，指挥军队的权力也已经没有了。《颜氏家训·杂艺》云：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射，只能演习“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的所谓博射；而“河北文士，率晓兵射”。两相比较，江南士族积弱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检验王伊同《五朝门第》中的《高门世系婚姻表》，可知侨姓士族终东晋世居显宦不衰的，并不很多。极其狭窄的通婚范围，可能是士族人才日趋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皇室也是如此。到了东晋之末，王导、谢安那样的士族人才，元帝、明帝那样的东晋皇帝，史籍中再也找不到。士族凋零，本是重振皇权的机会；可是同时出现的是王朝腐朽，孝武帝欲振兴而无方。这样，昔日王马结合的那种政治局面，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来，都已难于维持。加以淝水战后北敌压力暂时解除，皇权与士族协力求存的需要也不复存在。末代皇朝险象丛生，局面在酝酿着大变，只是收拾残局的力量究竟何在，一时还看不清楚。刘牢之藉北府兵

力,本来可能结束门阀政治,推倒东晋朝廷,但他并没有这种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开拓道路。

从宏观来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迴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的正统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变的发生。这些都是历史运动的表象。历史运动的获胜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传播,是北方的各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 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 心,又是通过历史表象的纷繁变化才能完成的。

这就是本书的结论。这种结论,仅从东晋百年历史还难看得清楚,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通观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 注:

① 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使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当然,这只是就一种途径言之,而不是说东汉世家大族都出自西汉豪强大族。这一问题离开本书研究范围已远,故不作追溯。

② 美国学者 Dennis Grafflin 有另外的区分法。他在 *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4, 41:1) 一文中说,东晋五大门阀士族中,只有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两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又说这五族中只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可以说成是“老的贵族”。案“贵族”是日本学者自内藤湖南以来习指魏晋士族的用词,“老的贵族”应相当于本书所说的“旧族门户”。对于谯国桓氏, Grafflin 文未作说明,但在其所依据的他本人 1980 年论文 *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 (Ph. D. Thesis, Harvard) 第六五页的附表中,则将桓氏先世向汉代追溯到桓荣。他以桓彝为桓荣第十世孙,而他所列世系中第六世和第七世有其位而缺其名。这是他从桓氏先世的诸种异说中采用了《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桓彝别传》一说(案此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未以之列入“老的贵族”。

③ 诸阮前世事迹,略具于《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及注、同书《杜恕传》注引《阮氏谱》、《世说新语·赏誉》(上)“王戎目阮文业(武)”条及注引杜笃《新书》、《世说人名谱·陈留阮氏谱》等。下文即综合这些史料言之,不一一出注。

④ 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谓“《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谡等撰”。《宋史》卷四三一《儒林·聂崇义传》谓阮谡受礼学于颍川蔡毋君,取其说为图”云。

⑤ 《南朝寒人的兴起》,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⑥ 名士,不同时期其条件也不全同。大抵汉末名士长于识鉴,魏晋名士特重玄言。少数人如光逸、王尼,门户太低,因特殊条件而得游于名士行列,但终不能成为士族。东晋末,王恭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见《世说新语·任诞》。识者或谓王恭饰己之短,故作此语。

⑦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⑧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⑨ 直到唐代,武人入士流,犹遭非议。《通鉴》唐显庆四年六月条:“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晋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⑩ 《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⑪ 陈寅恪先生从袁绍、曹操交争中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识见卓绝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社会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贯串到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

这一极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于曹马之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似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主旨，这里不作探讨。陈寅恪先生的见解，见《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末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⑫ 关于门阀士族支持桓玄，祝总斌同志《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有丰富的引证，可以参看。

⑬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一六二—一六三。我在前举《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中，曾提到刘、刁辈依旧名取客是激成王敦之叛的经济原因，但未看出此举特别损害吴姓大族的经济利益。

⑭ 参《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文字小异。

⑮ 参《文选》卷六〇任昉《齐竟陵王行状》注引，文字小异。

⑯ 金谷不但是苑囿，而且是田庄。《世说新语·品藻》，“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条注引石崇《金谷诗·序》及《御览》卷九一九引石崇《金谷诗·序》，对金谷有更详细的描述。

⑰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⑱ 《三国志·吴志·孙登传》谓张昭读《汉书》有师法，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太子孙登。案张昭的师法，以张昭的年岁推之，当是得之于汉代人的传授，并非孙吴时的学风如此。

⑲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见《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⑳ 董京，《太平御览》卷502引王隐《晋书》，谓以魏晋禅代，遂被发为狂。

㉑ 范梈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三十六载。以其卒年计之，当始自嘉平元年，即司马懿诛曹爽之年。

㉒ 《晋书》卷七五《刘劭传》孙绰谏刘劭语。

㉓ 前引书第三二六页。

㉔ 事见《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卷四九《阮瞻传》。

㉕ 《广弘明集》卷一八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

㉖ 《庄子·逍遥游注》，郭庆藩《集释》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隐逸的陇西辛谧，赞美此说，竟称“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见《晋书》卷九四《辛谧传》。

㉗ 今本《晋书》无。案汉末《古文尚书》孔氏之本绝，魏晋之际荜阳郑冲私于民间得而传之。参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关于此书，异说颇多。陈梦家认为孔传《古文尚书》并不是西汉人孔安国而是东晋另一个孔安国的传本，见陈先生《尚书通论》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有关各节。但是此说尚为一种新的探索，似难定谳。